

在中国的军事史上,没有一个军事院校像黄埔军校,在短时间内能够那样大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但就有这样一群黄埔人,从东征北伐到十年内战,从抗倭战争到二次国共内战,战功显赫,扬威中外,他们是国共两党历史的书写者,而其中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朱兴汶则经历了“潜伏”般的两次传奇起义经历。

【齐鲁英烈谱】

两次起义的国民党少将——朱兴汶

□王功彬

投身反蒋,两次入监狱

朱兴汶,字济民,1907年3月出生在滕县南沙河镇冯庄村,行四。朱家生活非常贫穷,一家六口借住在本族的茅屋内,靠推石磨摊煎饼度日。人穷志不短,幼小的朱兴汶就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读书时特别刻苦用功,6岁在私塾学堂能吟咏《三字经》、《大学》、《中庸》等文章,得到老师嘉许;1916年朱兴汶考入滕县一中,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在这里,朱兴汶结识了使他受益一生、改变一生的同学刘子衡。

1925年8月,朱兴汶在河南开封加入了国民党,9月,朱兴汶在三哥朱殿元的帮助下,顺利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第一团二连。

1928年4月,朱兴汶参加第二次北伐,同年8月留任山东日照县公安局任公安局长,兼日照县反日会执行部长。1929年回到老家滕县,任国民党滕县党部委员,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反蒋活动中去;因有人告密,朱兴汶在两年内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同学刘子衡闻讯后,找到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帮助营救,才得以释放。1934年朱兴汶入杭州警官学校学习,后被派往烟台,负责搜集日、满、朝鲜等方面情报,易职后远赴兰州,任警察分局局长。

回滕县,铲除汉奸县长

1947年12月,朱兴汶又一次辞职回滕,经刘子衡介绍,被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委任为少将高参,负责督训滕县及附近地区的地方武装,随后朱兴汶在滕县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汉奸运动。

时值国民党政府腐败不堪,滕县政局江河日下,人民群众反抗情绪剧增。因此,朱兴汶在幕后组织力量,以滕县师范学生为核心力量,把反对滕县党、政、军、团、参的

斗争全面开展起来。此“倒滕”事件曾震撼了国民党当局,引起蒋介石的高度重视,最后还是被朱兴汶一一化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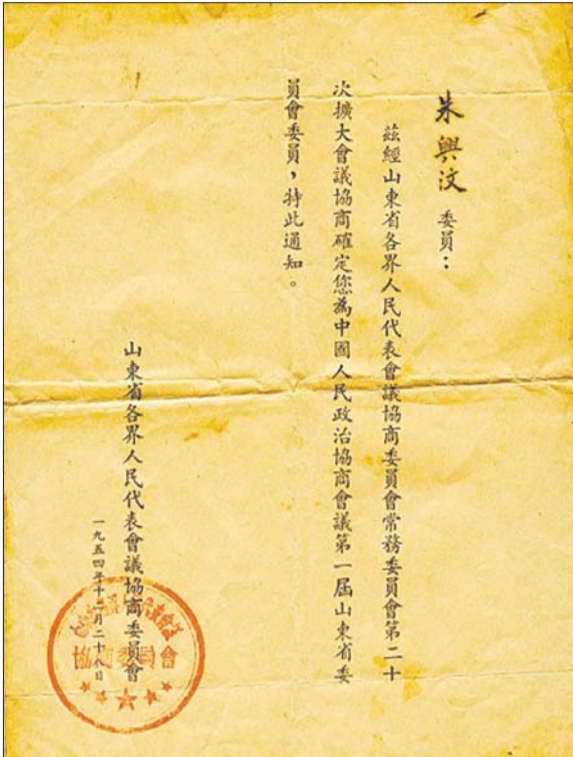
1948年3月,经中共华东局地下党员王道建议,利用刘子衡与王耀武的关系,朱兴汶被王耀武委任为滕县县长。朱兴汶到任后,把关押在狱中的革命群众全部释放出来,又把驻滕国民党部队逮捕的几十名中共干部全部释放,还减免农民历年来的欠粮,把原县长私存的联合国救济物资发放给困难百姓。

1948年6月,人民解放军大军围城,第二次解放滕县的战斗即将打响,驻守滕县的国民党部队不战而逃,朱兴汶便带领滕县自卫总队和山东保安18团南撤到临城,经过中共地下党的联络,10月下旬,朱兴汶率国民党军70人在韩庄(今济宁市微山县韩庄镇)举行起义。考虑朱兴汶日后对敌工作的需要,这次起义的消息华东局没有对外公开。

接派遣,暗中潜伏青岛

1948年12月,朱兴汶与八路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见面,安排他去益都(今青州市,时为华东局驻地)向华东局全面汇报对敌斗争的经过,受到了华东局刘贯一部长和舒同主任的热情接待;并接受华东局交给他的两项任务:一是到南京邀请同学刘子衡先到华东局,再转北平;二是深入敌区,利用各种关系,继续开展瓦解工作。于是,朱兴汶奔赴南京找到刘子衡,说明来意后,刘子衡又向顾祝同(时任国防部参谋总长)提出去解放区的事情,顾表示同意,并把刘子衡由南京经上海去青岛的沿途食宿问题,都做了细致安排。此时,山东省境内,唯青岛由国民党军队驻守,其他地区大都解放;因此,朱兴汶为能够安全顺利地打入青岛驻军内部,又请刘子衡协调顾祝同,让顾给时任青岛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祺写了一封信。刘安祺黄埔三期毕业,是崂县韩庄人,也算是老乡。

到青岛后,朱兴汶被刘安



1954年朱兴汶参加省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通知书。

祺委任为青岛港口司令部参谋处长。1949年1月,朱兴汶安排刘子衡的大哥刘位庚等人渡过戒备森严的胶州湾,由红石崖上岸,向华东局报告敌情,再返回青岛把刘子衡其他人送到解放区。朱兴汶此举深得华东局舒同、刘贯一、许世友等首长的称赞,同时也让大家对朱兴汶孤军奋战在险象环生的敌军内多了几分担心。

四川广元再次起义

1949年6月2日,因没完成华东局交给的任务,朱兴汶只好跟着刘安祺大军一起撤到台湾。1949年8月,再次返回大陆的朱兴汶又被任命为甘肃天水交警总队教导第一总队少将总队长。1949年8月3日,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率先带领二十师一部,由天水东门浩浩荡荡开进天水城,宣告天水解放。朱兴汶所在的交警总队也不得不南撤到四川省三台县上新桥。

此时,蒋介石政府为“坚守西南,加强巴山防线”,让大巴山的16集团军和95军黄隐部驻守广元、昭化、剑阁一线,并在广元县城设置城防、

警备司令部和前线指挥部。

9月15日晚,时为广元交警第一总队队长兼城防司令的朱兴汶见起义时机已到,便和李勇烈(中共特派员)、交警5中队队长赵文轩(滕县籍黄埔21期学生)在广元县城北门总队部秘密成立起义领导小组。朱兴汶率主力占领剑门关断沟崖,利用有利地形,配合解放军切断胡宗南部退路,赵文轩率所属各队保护嘉陵江渡口浮桥和七个弹药仓库及发电厂的安全。解放军先遣部队与李勇烈取得联系后,敞开正面公路,让胡宗南部撤退。12月3日下午,朱兴汶先下令广元县自卫总队立即出城,第三天晚,又率所属1500名官兵向剑门关撤退。

1949年11月12日,是一个无上光荣的日子,朱兴汶在三台县上新桥镇,终于与解放军50军149师取得了联系,宣布起义投诚并编入该部。因起义成功,受到西南军区的通令嘉奖。1952年5月,朱兴汶转业回到滕县老家,在冯庄小学任教,两年后到兖州县苇园小学教书,同年被当选为山东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1969年12月31日朱兴汶去世,终年62岁。

【乡间回忆】

养马

□庄培耀

大包干以后,我家承包了十几亩地,终于有了自己可以自由耕种的土地了。春天,冰雪消融,趁星期天,我和姐姐跟着父母一起去耙地。我小身子轻,就蹲在耙上晃把,父母和姐姐拉。松软的土地走在上面像走在沙漠里,空着手都够累的,何况还要拉着耙和我。拉一会,他们就累得气喘吁吁的。看到不远处有马拉着耙地,我们出神地看着,心里都想,我家什么时候有马就好了。

有一次父亲赶集回来,兴冲冲地对我们说他买回马来了!我们赶紧跑出去看,父亲买回的是一匹黄色的马,高高大大的,健壮威武,特别是四只大蹄子,一看就令人望而生畏。马有了新家,父亲还把马装饰了一番。他做了个红馒头挂在马头上,又找了个铃铛拴在马脖子上。这样,马一走起来红缨摇曳,铃铛叮当作响。这匹马很老实温顺,从不尥蹶子,我们全家老少都能使唤,我原先的恐惧感一扫而光,很快就喜欢上了它,一有空就牵着出去放马。到了晚上家畜都趴下睡觉了,可我从没见过马趴过,它始终保持肃立警觉的姿势,就像一位整装待命的战士,随时准备出征。

有了这个帮手,我们全家都解脱出来了,再耙地时父亲只管牵着马,我在后面晃把就行了。松软的土地上,马低着头拼命往前拉,马蹄子一陷一个深坑,浑身的肌肉也一颤一颤的。初春暖还寒,但马身上不一会就腾起热气,汗水把毛都湿透了。到了地头休息时,马静静地站着,我心痛地抚摸着马,它的眼睛大大的,睫毛特别长,棕色的瞳仁能照出我的影子,但丝毫看不出有怨恨的眼神。我捡了些干玉米叶喂它,它叼了几口就不吃了。父亲说,马在有套具在身时不吃也不跑,时刻准备着干活。而且干活时越拉不动越使劲,因为它怕陷进地里拉不出来。早年大队里挖井,有两匹马就活活累死了。经过几千年的驯化,原本狂野的马已变得如此忍耐和忠实。有时耕地时没人牵马,父亲只要扶住犁吆喝几句,它也能听懂父亲的各种专用口令,顺从地按着父亲的意图走。从地里回家,父亲把马牵到棚里总是拍拍马脖子,疼爱地说:“累了一天,歇歇吧!”马晃晃耳朵像听懂了一样。

马那么给我家出力,我们全家都尽力好好照顾它。每天早晨父亲都要牵着马出去溜溜,让马到河里喝喝清水,再到沙土里打个滚,还用铁刷子把马身上的毛梳理一遍。我则把马棚里的粪便清理出去,铺上干土,让马棚干干爽爽的。星期天,就跟年近的爷爷一起铡草,为马准备草料。每天晚上,母亲饮完马,就在马槽里加上夜草。马吃起干硬的豆粕就像是吃脆萝卜一样“咯嘣”“咯嘣”响,在寂静的冬夜里显得格外清晰。

买了马不久,父亲又买了辆旧马车。从此以后,马车就成了我家的重要交通工具,不管是种地还是赶集、走亲戚,随时把马从棚里牵出来,驾上轅就上路了。去赶集时,马车走在林荫大道上,父亲把手中的鞭子甩出一个炸响,马就一路小跑起来,清脆的马蹄声和悦耳的铃声一齐响起。从集上回来,父亲往往疲惫不堪,坐在马车上颠颠地很快就睡着了。等睁开眼一看,咦,早已到家门口了。老马识途,马车可以无人驾驶呢。

近些年,村里养牲口的越来越少,家家户户都买上了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在地里穿梭。许多人都劝父亲不要养马了,冬天不干活还要天天伺候,多费事。可我们全家都觉得冰冷的机器哪能跟听懂话的马相比。我们全家早已把马当成家里的一员,哪舍得卖掉。父亲说,要把马一直养着,直到它老了死去。

不幸的是,一语成谶。有一天马突然趴下了,还不吃不喝的,父亲脸上现出凝重的神色,他说,马趴下说明它病了。父亲立刻找来兽医,全力抢救,兽医说马太老了,已无回天之力。就这样,几天后这匹陪伴我们多年的老马永远离开了它耕种的这片土地,我们全家为此伤心了好多天。

【“中学忆旧”之二】

□安家正

黄汉充是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黄云眉的儿子,他与我同级不同班,我在五班,他在六班,对门而居。我与及黄先生相识,乃是因为办学校黑板报的机缘。我们黑板报的社长刘维倩后来成为黄汉充的终身伴侣,她带我去黄府就是为了请教黑板报改名的事。

我们的黑板报原名叫《激流》,黄先生说,你们年轻人,激情澎湃,这名称恰如其分,生动形象,有冲击力。可是要改名《学习与劳动》,黄先生又说,事实也好,学校无非这两件事。刘维倩说,改名是新来校长的意思,老先生沉吟片刻,说道:“那就不要伤了和气,照办而已,反正又不是原则问题。”

同学黄汉充

老先生非常随和,慢言细语,娓娓道来,令人如沐春风,丝毫没有将己见强加于人的意思。面孔可亲,和蔼之至。什么叫长者风采,第一次见面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此,我就觉得那幢小楼非常诱人,因为那里有史学泰斗且平易近人,真想常去请教,但心里又十分矛盾。前辈时间宝贵,我的问题却十分幼稚。所以每每压抑了想去的冲动,但也常借故登上那小楼的台阶。

通编语文教材中选了一篇黄宗羲的《原君》,洞幽的见解、犀利的议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得知老先生竟是大思想家后裔,这种崇拜更是与日俱增。但令人诧异的是,不仅从黄汉充口中从未听说这

件事,连崇尚“家学渊源”的老先生也对此缄默其口。只是有一次谈到治史,涉及到黄宗羲,引得老先生长叹一声,也让我越发狐疑。

那次先生教我,治学要才、学、识兼备。难免人云亦云,却要不为己误,更不为人误。“我不赞成顾颉刚,可也不反对顾先生。”老先生恬淡地说,“无论如何,占有史料还是前提,竭泽而渔,不惟正史,野史也不妨涉猎。”

当时对“古史辨流”的批判正方兴未艾,自然涉及“观点”与“史料”的关系。老先生说:“我既不赞成才子借题发挥,哗众取宠,也不欣赏冬烘皓首读经,甘做双脚书橱”。“初生之犊不畏虎”,我那时以“新锐”自居,斗胆向老先生进

言:“何不独树一帜?”我说,“史料已经汗牛充栋,种类繁多,但观点则因循守旧者多,今日更是众说纷纭,难以梳理,为什么您老不能像黄宗羲那样参透历史,廓清迷雾,一洗御用文人的媚骨,写本全新的《史学思潮史》呢?”当时确实幼稚,自以为多么高屋建瓴,岂料却一下子破坏了温馨的谈话气氛。老先生沉吟良久,方徐徐地说道:“愧对先人。”告别的时候,他又说:“你喜欢历史,未尝不是好事,但不一定去攻《明史》。”见我不解,他道:“材料太多。二十四史中卷数最多,还有《纪事本末》。”

当时确实没弄明白老先生的良苦用心,经历过“文革”,才似懂非懂。